

《中外交通史》導論

本書名曰《中外交通史》，顧名思義，所敘乃古代中國同世界各國交通往來之情況與過程。就時間而言，上自周代，下迄清代前期（1840年鴉片戰爭以前），上下垂二千餘載。以地域而論，則凡今日中國以外之國家、地區，其與中國歷代之關係，概在論述之列。換言之，本書係以中國為本體，敘述歷朝對外關係的通史。與傳統的中西交通史或中國南洋交通史不同，本書所述既不限於西域，也不限於南海諸國，而還包括了中國同日本、朝鮮及其他一些國家的關係。

關於國際之間的交通，古今載籍採用之名目繁多，如交通、交涉、交流、交往、往來、流通、通交、外交等等，近來多有用“關係”（Relation）的，稱中外關係史。然不論名稱如何，其所包含之內容則大體相若，諸如國際之間外交關係的建立；政治使節之互派；兩國之間的征伐、交戰或媾和；外國對中國的朝貢與通商貿易關係；歷史上中外民族之融合與遷徙；醫藥、曆算、建筑及其他科學技術的互傳；絲綢、陶瓷、香藥等物資之交流；文學藝術之相互影響；語言、著作之傳譯；宗教之傳播；留學生之互派；陸、海路旅行路線之開闢與記錄；等等。

鑑於古代中外之交通源遠流長，距今之時代既久遠，交通之國家或地區又極為廣泛，故交通行程地理之考證在中外關係史中佔有重要的地位。因為倘若地理方位、交往國家不明，則一切論述、分析皆成無根之木、無源之水，可謂一錯百錯。因此本書除對中外關係予以綜合之敘述外，還用相當之篇幅介紹歷代重要的陸、海路對外交通行程。

根據中國歷史之發展和各國朝代之不同情況，本書把中國古代對外交通史分成八個時期，每個時期一編。這八個時期及其發展趨勢大致如下：

1. 先秦至秦代：中外交通之傳疑、萌芽時期
2. 兩漢時期：中外交通之開拓時期，陸路居於主位
3. 三國兩晉南北朝：中外交通持續發展，陸路仍居主位
4. 隋唐代五代：中外交通之勃興時期，海路日趨重要
5. 兩宋時期：中外交通持續發展，海路居於主位
6. 元代：中外交通之鼎盛時期，陸路臻於頂峰
7. 明代：中外交通繼續興盛，海路達到極點
8. 清代前期：中外交通之新舊交替時期

值得注意的是，地處南海的香港在古代中外交通史上，曾佔有一席之地。早在唐代，香港附近的屯門一帶就是南海對外交通之衝要，為廣州交通海外的必經之地。《新唐書》卷四十三下之地理志曾載唐貞元宰相賈耽所記邊州入四夷之通道，其《廣州通海夷通》曰：“廣州東南海行，二百里至屯門山，乃帆風西行，二日到九州石，又南二日至象石，又西南三日行至占不勞山……”，此航線即由廣州經屯門、九州石（今海南島東的七洲列島）、象石（今海南島東南的大洲島）而抵越南的占婆島（Culao Cham），然後順中南半島、馬來半島出馬六甲海峽，渡印度洋而通航於阿拉伯一帶。宋代曾公亮的《武經總要》、周去非的《嶺外代答》也都提及屯門，謂蕃國“其欲至廣者，入自屯門”，足見屯門在唐宋時不啻廣州之外港。

爾今之香港更被譽為“東方之珠”，係世界最著名的自由港之一。她在國際金融、貿易、交通諸方面固有其重要性，至於文化方面則尤因東西交匯而頗具特色。故大力開展中外交通史之研究，實乃港人義不容辭之舉，吾儕應為此而不懈地努力。

為有助讀者作進一步之深入瞭解，筆者試據多年研討之一得，管窺蠡測，將中國古代對外交通歷史的若干特點，約略勾劃於下：

(一) 根據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等的確載，中國中央王朝之大規模正式對外交往，當始於漢武帝時張騫之通西域，史稱張騫“鑿空”，近人則謂之曰開闢絲綢之路。自是以降，迄1840年之中英鴉片戰爭，在兩千餘年內，中外之間的交往始終沒有間斷過。雖然有時因和某一國發生戰爭而斷絕官方之來往，有時中央王時採取閉關鎖國之政策，但民間之接觸一直未曾停止。可以說，中國在各個不同的時期，對不同的國家或地區，總是進行著不同方面、不同形式的交流。

(二) 一般來講，中外之間的交通往來多半從民間接觸開始，然後才有官方正式關係的建立，同毗鄰國家或地區之交往尤其如此。然亦不可一概而論，因為中國同比較遙遠的地區之交通，限於種種條件，有時是民間交往很難進行的，故也有官方之交聘先於民間之接觸的。

(三) 中國歷代之對外關係，和平交流固佔有重要之地位，然亦不乏征伐與交戰。例如越南原係中國領土之一部，自五代獨立後迄今，同中國之交戰幾無朝無之。因此我們應尊重客觀的歷史事實，對和平、戰爭等諸方面之關係同時進行深入的考察，切忌以今日雙方政治關係之冷暖，不適當地作片面之強調。

(四) 古代之中外交通途徑有陸路、海路兩種，陸路交通早於海路交通。如西域、南海之對外交通路線在西漢時均已出現，而陸上絲綢之路的開闢略早。至於正式使節之派遣更是這樣，如張騫出使西域各國發生在西漢，而朱應、康泰之出使南海諸國則已在三國時代了。從實際情況看，這一點也是不難理解的，因為陸路交通只要有人的兩條腿或者再加匹馬或駱駝就可進行，海上交通則至少須造條船，更遑論對付大海大洋之驚濤駭浪了。不過自隋唐以還，隨著造船、航海技術水平之進步，加以北方傳統的通西域之道路經常為游牧民族所阻隔，故海路交通遂日趨重要並逐漸居於主位。

(五) 在中國歷史上，各個朝代之治亂興衰不盡相同，此於對外交通有著重大的影響。總的來看，在國家大治之盛世，其對外交往均呈

現蓬勃發展之形勢，陸路、水路交通並盛，而且官方之外交關係重於民間之接觸往來，觀諸漢、唐、元、明、清等朝莫不如此。然在國勢衰頹或割據分裂之際，如三國兩晉南北朝以及五代宋遼金時期，則官方之外交活動頓減，民間接觸居上。鑑於國家之衰亂往往源自北方游牧民族之擾攘，而交通西域的陸路亦因此受阻，故三國兩晉南北朝及兩宋時期，南方之偏安王朝均大力發展海上之對外交通。

(六) 一部中外交通史，記載著眾多優秀人物之卓越事蹟。對於歷朝之外交關係，一些政治使節固然發揮了重大作用，而中外僧侶、傳教士、學子、航海家及商人等之貢獻尤不可忽視。試想，無數高僧為了追求佛教真理，歷盡千辛萬苦，冒著九死一生，走過上無飛鳥、下無走獸之流沙地帶，翻越冬夏常雪、百壁千仞之葱嶺，方始進入印度。許多舟子船工駕駛簡陋的帆船，不畏驚濤駭浪，甘歷“針迷舵失，人船孰存”之萬險，長年堅持在茫無涯岸的漲海大洋中航行。他們的勇敢、犧牲精神彌足珍貴，他們對中國同外國交通所作出之貢獻實值後人永遠景仰。故張騫、班超、朱應、康泰、法顯、玄奘、義淨、鑑真、周達觀、汪大淵、鄭和、王大海、謝清高，以及慧超、圓仁、蘇萊曼、伊本·巴圖塔、馬可·波羅、利瑪竇、艾儒略、南懷仁等等名字，在中外交通史上將是永垂不朽的。

(七) 中國在與外國之交往中，吸取了大量的外來物質、精神文化，並加以消化，變成了本土之物，為自身所用。同時，中國也將其古代燦爛光輝的文化傳播至世界各國，造成了很大的影響。一部中外交通史，就是各國相互交流、彼此學習的歷史，絕非一方專門輸出、另一方單純吸收。譬如中國深受印度佛教、聲韻、文學、藝術等方面之影響，但另一方面它也將絲、紙、瓷、印刷術等等先進文明傳給了印度。有的人只看到中國佛教源自印度，就認為在古代純係中國學習印度，這是很片面的。殊不知一種文化不興於本土而外傳的例子，在世界史上比比皆是。例如基督教發源於西亞，承繼了猶太教之經典，初受馬羅帝國所鎮壓，爾後竟盛行於歐、美各國；佛教肇始於印度，

但後來在東亞、東南亞各國廣泛流傳，而印度本土卻逐漸式微乃至歸於消滅；馬克思主義創立於歐洲，今日之中國、蘇聯及許多東方國家奉之為經典著作，然在歐、美卻罕受重視。即就佛教傳入中國一事而言，亦有相互交流的問題，在印度不僅其本土之佛教趨於消滅，就連其自身的歷史也幾乎盪然無存，故印度有識之士曾云“如果沒有法顯、玄奘和馬歡的著作，重建印度歷史是不可能的”，此誠公允持平之論矣。

(八) 在古代，由於中國向以強盛之中華帝國而屹立於東方，歷朝天子多自奉為“天朝上國”，視其他國家之來華為朝覲、貢獻。當時中國確也以造紙法、印刷術、指南針、火藥等四大發明及其他物品、技術，使其絢麗多姿的文明遙遙領先於世界各國，就是到了明初，鄭和下西洋還顯示出中國航海技術水平大大超出歐洲國家。可是自文藝復興以來，東西方在世界文明天秤上所佔的比重，逐漸發生了變化。明末清初西方傳教士之來華及西學之東漸已突出地表明了這一點。清代前期實際上已是中外交通的新舊交替時期。到了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，傳統的以中國為主的古代中外交通史宣告終結，新的中外關係開始出現。中國不僅須向歐、美學習先進的科學技術，而且經常被迫向西方各國忍辱屈服。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，中國的國際地位有所提高，但“技不如人”的狀況依然未有根本之轉變。本書只寫到1840年為止，1840年後的中外關係通常被歸入中國近代史。至於未來嶄新的、東西方諸方面均屬對等之中外關歷史，何時方可動筆，吾人將拭目以待。

這裏必須指出，中國自古以來就十分重視中外之交通與關係，中國史學具有記載、研究四裔及外國的數千年之優良傳統。先秦載籍《山海經》已記有東西南北四方的一百多“國”。中國歷代之正史，從《史記》至《清史稿》等“廿六史”，都專為四裔、外國列傳。《資治通鑑》及中國歷代之實錄、會典、會要，《通典》、《通志》、《文獻通考》、王圻《續文獻通考》等“十一通”，《北堂書鈔》、《藝文類聚》、《白孔六帖》、《初學記》、《太平廣記》、《太平御覽》、《事類賦》、《冊府元

龜》、《玉海》、《事林廣記》、《群書集事淵海》、《永樂大典》、《圖書編》、《三才圖會》、《古今圖書集成》、《淵鑑類函》等等類書，以及《元和郡縣志》、《太平寰宇記》、《元豐九域志》、《輿地廣記》、《輿地紀勝》、《方輿勝覽》、《元一統志》、《寰宇通志》、《明一統志》、《清一統志》、《嘉慶重修一統志》等全國總地志，也都記載有關於外國的豐富資料。

還有各類的專書，往往雜有關於中外交通之若干片斷，例如下列方面之著作：(1) 地理著作：如《山海經》、《禹貢》，晉常璩《華陽國志》，北魏酈道元《水經注》，唐劉恂《嶺表錄異》，宋范成大《桂海虞衡志》、《吳船錄》，元陳大震、呂桂孫《南海志》，明錢古訓《百夷傳》、永樂官撰《交趾總志》、倪輅與楊慎《南詔野史》、張天復《皇輿考》、田汝成《炎徼紀聞》、朱孟震《西南夷風土記》、程百二《方輿勝略》、何喬遠《閩書》，清顧炎武《天下郡國利病書》和《肇域志》、顧祖禹《讀史方輿紀要》、師範《滇繫》、劉統勳等《西域圖志》、徐松《西域水道記》；(2) 地圖：宋佚名《華夷圖》、《禹跡圖》、《歷代地理指掌圖》及黃裳《墜理圖》，元《經世大典地圖》，明佚名《鄭和航海圖》、姚虞《嶺海輿圖》、羅洪先《廣輿圖》、喻時《古今形勝之圖》，清顧祖禹《讀史方輿紀要·輿圖要覽》、佚名《西南洋各番針路方向圖》、《東南洋海道圖》、《輿地全國》、《乾隆內府輿圖》；(3) 諸家異物志：東漢楊孚《交州異物志》，吳朱應《扶南異物志》、萬震《南州異物志》、沈瑩《臨海水土記》，晉嵇含《南方草木狀》、徐衷《南方記》、劉欣期《交州記》、王隱《交廣記》、黃恭《交廣記》，劉宋沈懷遠《南越志》、顧微《廣州志》、裴淵《廣州志》，唐孟瑄《嶺南異物志》；(4) 宗教著作：晉葛洪《太清金液神丹經》，梁釋慧皎《高僧傳》，北魏楊衒之《洛陽伽藍記》，唐釋道宣《續高僧傳》和《釋迦方志》、釋道世《法苑珠林》、釋慧琳《一切經音義》、佚名《翻梵語》、《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》，宋贊寧《宋高僧傳》、法雲《翻譯名義集》、《菩提伽耶碑》；(5) 農、醫、兵家著作：北魏賈思勰《齊民要術》，宋唐慎微《經史證類備急本草》、洪蜀《香譜》、曾公

亮等《武經總要》，明李時珍《本草綱目》、茅元儀《武備志》；(6) 筆記、雜著：晉張華《博物志》、郭義恭《廣志》，唐張鷟《朝野僉載》、段成式《酉陽雜俎》和《酉陽雜俎續集》、段公路《北戶錄》、佚名《梁四公記》，宋龐元英《文昌雜錄》、沈括《夢溪筆談》、朱彧《萍洲可談》、葉夢得《石林燕語》、吳曾《能改齋漫錄》、周輝《清波別志》、趙彥衛《雲麓漫鈔》、吳自牧《夢梁錄》、岳珂《程史》，元周密《癸辛雜識續集》，明祝允明《前聞記》和《野記》、高岱《皇明鴻猷錄》、蔡汝賢《嶺海異聞》和《嶺海續聞》、何喬遠《名山藏》、陳仁錫《皇明世法錄》，清屈大均《廣東新語》。

由此可見，中國史籍有關外國及中外交通之資料，實可謂汗牛充棟，浩如煙海。至於記載外國以及中外關係的專門性著作，在中國圖書寶藏中亦如恆河沙數，不勝枚舉，此種載籍大致可以分為下列數類：

1. 交通國外的政治使節及其隨從之見聞記、回憶錄：漢張騫《出關志》、班勇《西域風土志》，吳康泰《外國傳》，隋韋節《西蕃記》，唐王玄策《中天竺國行記》、達奚通《海南諸蕃行記》，宋徐兢《宣和奉使高麗圖經》、《宋鎬行錄》，金烏古孫仲端《北使記》，元耶律楚材《西遊錄》、丘處機《長春真人西遊記》、劉郁《西使記》、徐明善《天南行記》、周達觀《真臘風土記》、《張立道行錄》，明張洪《使緬錄》、陳誠等《西域行程記》和《西域番國志》、馬歡《瀛涯勝覽》、鞏珍《西洋番國志》、費信《星槎勝覽》、鄭舜功《日本一鑑》，清圖理琛《異域錄》。

2. 西行求法高僧之行記：晉法顯《佛國記》、智猛《遊行外國傳》，劉宋曇無竭《外國傳》、法盛《歷國傳》，北魏宋雲《魏國以西十一國事》、《惠生行記》，唐玄奘《大唐西域記》、慧立《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、義淨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》和《南海寄歸內法傳》、慧超《往五天竺國傳》、圓照《悟空入竺記》、真人元開《唐大和上東征傳》、圓仁《入唐求法巡禮行記》，宋繼業三藏《赴天竺記》。

3. 旅行家、航海者之遊記、針經與見聞錄：唐杜環《經行記》，五代佚名《西天路竟》，元汪大淵《島夷誌略》，明吳樸《渡海方程》、佚名《順風相送》，清佚名《指南正法》、大汕廠翁《海外紀事》、潘鼎珪《安南紀遊》、郁永河《海上紀略》、程遜我《噶喇吧紀略》和《噶喇吧紀略拾遺》、王大海《海島逸誌》、黃可垂《呂宋紀略》、葉羌鏞《呂宋紀略》和《蘇祿紀略》、佚名《緬略》、謝清高《海錄》、李鍾珏《新加坡風土記》等。

4. 有關朝貢、市舶的記錄與外事官員之專著：梁蕭繹《職貢圖》，隋裴矩《西域圖記》，唐賈耽《邊州入四夷道里記》，宋周去非《嶺外代答》、趙汝适《諸蕃志》，明宋濂《渤泥入貢記》、黃省曾《西洋朝貢典錄》、高岐《福建省舶提舉司志》、王宗載《四夷館考》、張燮《東西洋考》，清江蘩《四譯館考》、陳倫炯《海國聞見錄》、藍鼎元《南洋事宜論》、傅恆等《皇清職貢圖》、梁廷桢《粵海關志》、林則徐等《四洲志》、魏源《海國圖志》。

5. 有關同四裔交戰、征伐之實錄：元佚名《元朝征緬錄》、《招捕總錄》，明佚名《安南棄守本末》、邱濬《平定交南錄》、鄭若曾《日本圖纂》、胡宗憲《籌海圖編》、張鏡心《馭交記》，清周裕《從征緬甸日記》、王昶《征緬紀聞》和《征緬紀略》、魏源《聖武記》。

6. 諸家四裔、外國之專門著作：魏魚豢《魏略西戎傳》，晉佚名《交州外域記》、支僧載《外國事》、釋道安《西域志》，劉宋竺枝《扶南記》、竺法維《佛國記》，佚名《林邑記》、《日南傳》、《交州南外國傳》，隋佚名《天竺記》、張太素《隋書羅刹等國傳》，唐樊綽《蠻書》，元黎崱《安南志略》、周致中《異域志》，明黃衷《海語》、李文鳳《越嶠書》、王世貞《安南傳》、薛俊《日本考略》、鄭若曾《安南圖說》、鄭曉《皇明四夷考》、嚴從簡《殊域周諮錄》、佚名《荒徼通考》、慎懋官《華夷花木鳥獸珍玩考》、蔡汝賢《東夷圖說》、葉向高《四夷考》、羅曰褰《咸賓錄》、鄭大郁《四夷考經國雄略》、包見捷《緬略》、鄧鐘《安南圖志》、

慎懋賞《四夷廣記》和《海國廣記》、魏濬《嶠南瑣記》、李言恭等《日本考》、侯繼高《日本風土記》、楊一葵《裔乘》、胡文煥《華夷風土記》、茅瑞徵《皇明象胥錄》、清尤侗《外國竹枝詞》、陸次雲《八紘譯史》、《譯史紀餘》和《八紘荒史》、師範《緬事述略》、顏斯綜《南洋蠡測》。

鑑於中國古代載籍有關四裔、外國之資料如此豐富，故它不僅對中外交通史、而且對亞洲各國之古代史研究均不可或缺。外國研究亞洲史地之卓有成效者，莫不多方利用中國史料。法國學者馬斯伯樂(H.Maspero)在研究中南半島時提到，“其中最可寶貴者要為中國載籍”，“中國之地志，自紀元前數百年以迄於今，大抵確實可考”。英國東南亞史專家霍爾(D.G.E.Hall)則云，“要獲得關於東南亞原始歷史的任何知識，中國史料是不可缺少的，但這些史料使研究者遇到莫大困難”。

但是儘管如此，近代以來中國關於中外交通歷史的研究畢竟是大大落後了。西方各國和日本的漢學家率先用比較科學的方法，利用中國豐富之文化典藏，以開展古代東西交通之研究。其中比較著名的有：法國的德吉涅(J.Guignes)，伯希和(P.Pelliot)，沙畹(E.Chavannes)，費瑯(G.Ferrand)，考迪爾(H.Cordier)，馬斯伯樂(H.Maspero)，塞代斯(G.E.Coedes)，烈維(S.Levi)，埃莫涅(E.Aymonier)，鄂盧梭(L.Aurousseau)；荷蘭的葛倫維爾(W.P.Groeneveldt)，希勒格(G.Schlegel)，戴文達(J.J.L.Duyvendak)，摩恩(J.L.Moens)；德國的李希霍芬(F.Richthofen)，佛蘭克(O.Franke)；英國的斯坦因(M.A.Stein)，玉爾(H.Yule)，紀利尼(C.G.E.Gerini)，勃勒德爾(R.Braddell)，菲利浦(G.Philips)，霍爾(D.G.E.Hall)，米爾斯(J.V.G.Mills)；美國的夏德(F.Hirth)，勞費爾(B.Laufer)，柔克義(W.W.Rockhill)，摩爾斯(H.B.Morse)，惠特利(P.Wheatley)，斯金聶(G.W.Skinner)；俄國的布萊資須納德(E.V.Bretschneider)；日本的白島庫吉、藤田豐八、桑原鷺藏；等等。

在西方的影響與促進下，近代中國的一些有識之士與學者對中外關係也逐漸重視起來，林則徐、魏源、徐繼畲、何秋濤、洪鈞、梁啟超、沈增植、丁謙、屠寄、王國維、羅振玉等等，在研究外國、探討中外交通方面均作出自己的貢獻。不過中國人在這一領域取得較大之成績，還是近半個多世紀以來的事。其中馮承鈞、張星烺、向達三位先生對包括西域、南海在內的整個中外交通之研究貢獻尤大，被譽為“北大三傑”，其拓荒之豐功偉績實不可沒。

此外，在中外交通的諸多具體方面，許多先生均有頗高之造詣，貢獻良多，例如：(1) 華僑史研究方面，有何海鳴、劉士木、李長傳、張相時、溫雄飛、陳達、劉繼宣、束世激等；(2) 中西交通史方面，如陳垣、方豪、岑仲勉、朱傑勤、陳受頤、白壽彝、楊志玖、全漢昇等；(3) 南海交通史方面，在四十餘年前於新加坡發起創辦南洋學會，並成為當時《南洋學報》主持人的姚楠、許雲樵、張禮千，允稱早期之“星洲三傑”；(4) 南洋民族研究方面，如林惠祥、徐松石等；(5) 南洋史地研究方面，如蘇繼庠、韓槐準、陳育崧、羅香林、饒宗頤、正賡武、邱新民等；(6) 中南半島諸國研究方面，如陳序經、黎正甫、陳荊和、呂士朋、黎東方；(7) 中泰交通史方面，如嵇翥青、陳禮頌、陳棠花、陳毓泰等；(8) 中緬交通史方面，如方國瑜、王婆楞、夏光南等；(9) 中印關係方面，如季羨林、許崇灝、常任俠、金克木等；(10) 中菲交通史方面，如吳景宏、劉芝田、陳烈甫、陳台民、王德明等；(11) 中日交通與琉球研究方面，如衛挺生、王輯五、梁嘉彬、梁容若、汪向榮等；(12) 中國與美洲之關係方面，如朱謙之、衛聚賢等；(13) 海外交通史方面，如章巽、韓振華、田汝康、莊為璣等；(14) 鄭和下西洋之研究方面，如鄭鶴聲、徐玉虎等。

上列諸氏定非半個世紀來中外交通史研究精英之全部，由於作者孤陋寡聞，遺漏在所難免。記得近代專治邊疆、地理之大家丁謙(1843-1919)有云，“文章，公器也。是非所在，無用迴護，指予疑誤，願拜厚貺”，筆者昔日在研討古代南海交通時，向以此為座名

銘，復蒙前輩學者張錫彤、吳文藻、聞宥、翁獨健等先生諸般指點與鼓勵，此生此世永誌銘感。今吳、聞、翁三先生已化鶴西遊，緬懷先哲對晚生之厚愛，不勝悼念。鑑於目前尚乏一部系統而明瞭之中外交通史或中外關係史，愚乃不揣譾陋編撰是書，實權作引玉之磚，以就教於四方之博雅君子，並奉獻給自己終身愛戴之師友。

(載《中外交通史》，香港學津書店1987年出版)